

黎澍·著
早岁



LUOTUO
CONGSHU

● 骆驼丛书

早岁

黎澍·著

I267/553

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

早岁

黎澍·著

早 岁

黎 澍 著

责任编辑：朱 正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6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65,000 印张：4.5 印数：1—3,100

统一书号：10109·2021 定价：0.89元

湘人：86—4

早岁

五



李樹

早多即知世中艰

——记老成新华西晚报的经过

李蔚

新华西晚报是在一九四五年以后国民党统治区民盟和
救国会等在重庆创办的一份报纸。创刊于一九四五年九月
半月日被查封。新华西晚报的兴衰，反映了中人民运的曲折
南方的历史。从创刊到升平和平解放胜利后的高潮，再
由高潮跌入低潮，终于发党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过程。新华
西晚报进行了民主运动，由低潮到高潮，在和平解放中
高潮。但总的说，那一段日子生活，很苦，很苦，不如重庆中办，
但我们毕竟有一份报纸，在希望中，我们自觉正在完成一项历史
性任务，因此尽管中办中办中办。我们痛恨国民党统治下
决心推翻它。为用打出来，无他志。所以战时老成同志所
回忆的平日的艰苦生活，
我们全社成员也
我们全社成员也

作者手迹

前 言

我听到过这样的劝告，大意说：不要讲自己的革命历史，以免引起儿女们的骄傲情绪。我对一些人刺刺不休地宣讲个人经历的习惯，本来就不大能忍受。所以倒也乐意接受这个劝告，闭口不谈往事。可是久了又不免引起怀疑：他为什么不大提他过去的经历？其中必有蹊跷。

“文化大革命”初期流行两句口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本来怀疑尽管怀疑，没有真凭实据，不能轻率判断。可是那时无法无天，谁管这些？一经怀疑，马上打倒。而一经打倒，就要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据说这叫专政，否则算不得革命。一场大闹剧就在一片打倒声中开场了。

我在《记湖南〈观察日报〉》一文的开头，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人们仿佛从一场非常难熬的噩梦中醒来”。可是定睛一看，原来梦中上演的闹剧

早已烟消火灭，但见龙吟细细，凤尾萧萧，简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然而文化大革命总算给我提醒了一件事，就是要尽可能真实地把关系许多人的共同经历记录下来。可以相信，人们的头脑已经清醒，不会再做噩梦了。但过去还是以不忘却为好。

此册辑录记述往事的几篇文稿，不涉及解放以来的经历，故名之曰《早岁》。

黎澍

一九八六年一月

目 次

前 言

记湖南《观察日报》.....	1
怀邓克生同志.....	21
记湖南《开明日报》.....	29
【附 录】 回忆《开明日报》的战斗（谌 霖）	
胡愈之、范长江和国新社.....	49
香港脱险和东江游击区的经历.....	56
早岁那知世事艰.....	64
——记在成都《华西晚报》的经历	
记上海《文萃》周刊和《文萃》三烈士.....	93
早期教育改革亲历记	115
【附录】醴陵私立开元学校船末（王力天遗作）	

记湖南《观察日报》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人们仿佛从一场非常难熬的噩梦中醒来。旧友相逢，谈话多以往事为题。因为实在谁都没有想到历史在梦境中居然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连举世共知的事实，都可以从中推演出种种似乎难以解释的疑问。至于默默无闻或向来不做自我宣传的人，事迹早已湮没不彰，就更不用说了。自从有了这样一番经历，人们发现了历史的价值：原来它对于认识自己和所处的时代是重要的，对于使同时代人的事迹有可查考是更加重要的。由于客观存在的这样一种必要性，我感觉有责任把一些关系许多人的共同经历记录下来，只是事隔多年，报纸缺失的已多，人们记得的也已经有限了。

我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结束了大学生活，在长沙从事新闻工作，同社会有了广

泛的接触，我想就从这里开始我和朋友们的共同经历的记录。于是查阅原报，参考已有记载，网罗放失旧闻，积久而为此记。

抗日战争前的长沙

湖南在北伐战争中是革命风暴的中心，在革命失败以后是反革命的和复古守旧的顽固堡垒。在反革命势力的内部斗争中夺得了权力的本地军人何键，是个彻头彻尾的国粹派，只认得洋枪洋炮，除此之外，不但坚决反共，而且反对一切西方文化。此人提倡尊孔读经，不遗余力，曾经不远千里，亲到曲阜朝圣。他还办了个国学专修学校，积极提倡国学，自任校长。长沙又一村有个小公园，他在里面修了一座“芸樵亭”（芸樵为何键别号），这芸樵亭，从来不开门让游人进去观赏。从窗外看去，里面空无所有，只是四壁挂着他亲笔正楷抄写的全部《论语》而已。在他的国粹思想影响下，中学语文课改成了“国文”，以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所编《经史百家杂抄》为教材；图画改为国画；音乐改唱京戏；体育改授拳术。还特设国术馆，广招江湖异人如柳森严等，一时称盛。思想界处于密封状态，有如一潭死水。

但是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逐渐从政治上裂开了一条缝。

一九三五年首先在北平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在长沙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一万余人在十二月二十日举行了游行示威。新的青年运动随之兴起。小学教师苏镜、唐荣前、廖申之（廖意林）等开始组织读书会，联系了一批进步青年。一九三六年夏，北平师大学生陈泽云（于刚）、陈德明、郭建恩、曹国智，北大学生萧敏頌，清华学生曹国枢和武汉大学学生李锐、魏泽同、彭秉朴，复旦大学学生文潞等，利用暑假同长沙进步青年一起开展救亡活动，建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组织，还办了个《湘流》三日刊，由李锐、魏泽同等主编。这个四开报纸坚持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终于被国民党查封。继《湘流》以后，常德三中毕业的进步青年金汉虚等又在长沙办了个《读卖周报》，不久也被查封。一九三七年五月，廖申之、唐荣前等又在这里创办了《现实》半月刊。当时的群众性救亡组织自然还不是公开的，刊物得以公开出版显然是利用了国民党统治的弱点。因为出面申请登记办刊物的人大概都是不引人注意的中间派，官方无从判断，往往是批准先行出版，报请内

政部登记并发给登记证，实际上是看看内容再说。所以进步出版物总是出了一年以上，还没有办完登记的合法手续。这是后来《观察日报》和《抗战日报》被勒令停刊的理由，也是许多进步报刊在一个时期内得以合法存在的理由。

抗战爆发以后

日本在一九三七年制造的七七事变引发了抗日战争。湖南在战争的最初几年是远离前线的大后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都从北方迁到这里来了。长期在外地活动的作家、戏剧家如田汉、张天翼、廖沫沙、蒋牧良等，社会科学工作者如杨东莼、薛暮桥、谭丕谟、廖庶谦等，纷纷到来。这些人同不愿继续上学的许多大学生的活动使长沙城里的空气热起来了。特别是在何键去职和张治中接手担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以后，仿佛出现了国共合作的可能。报纸杂志可以批准先行出版的缝隙被大大利用起来，成了毛主席在《必须强调团结与进步》一文中所说的“抗战初期仅有的一点言论出版自由”。在这样一点“言论出版自由”的鼓舞下，先后出版的刊物有以下各种：

《前进》（周刊，由前一年出版的《湘流》三日刊改组而成，萧敏颂等编辑）；

《民族呼声》（半月刊，吴磊伯、冯秀藻、杨润湘、邓克生等）；

《大众报》（潘开茨、张天翼、蒋牧良、魏猛克、张生力等）；

《火线下》（三日刊，黎澍、杨赓、唐文燮等）

当时这些刊物的编辑者多数是共产党员，没有党组织领导，自发行动，互不通气，所以有时还不免有点互相猜疑。实际上，大家都很艰苦，能筹集的资金很少，人力不足，稿源困难，印数无几，不能自给。我和杨赓办《火线下》三日刊，十六开十多页，忙得不亦乐乎，得到的结论是：不如出日报。而且确实产生了停办三日刊，改出日报的设想。正当这时，中央派任湖南省工委宣传部长任作民同志从陕北来到了长沙。他是中共中央书记任弼时的弟弟，自称姓周，并且告诉我，以后就叫他“老周”好了。他带来了西北大学（由北平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联合组成）党组织给我的介绍信。这信，我一眼就认出是我的同班同学郑登材（郑伯华）的字迹。我向老周谈了

办报的计划，他告诉我，长沙其他几个刊物的主办人都是党员，可以同他们商量如何把分散的力量统一起来。

徐特立同志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徐特立同志来到长沙。徐老在湖南素负重望，他以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主任的名义到来，使党的影响大大加强。大约是十二月的一个天色阴暗的下午，我沿着银宫电影院和国货陈列馆前马路边的人行道由东向西走，远远望见约有千数百人黑压压的鱼尾形阵势布满整条马路，由西向东迎面缓缓走来。近前一看，走在正中的是个白须白发的秃顶老人。这老人边走边同簇拥在他两旁的人谈话。这个鱼尾阵势的形成，是因为大家都迫切想听到他的谈话或者看他几眼。当时我还不认识徐老，但是这种不常见的人群的表情立即使我想到那走在中间的老人就是他。原来这天下午他刚在银宫电影院作了讲演。

在筹备出版《观察日报》的时候，大家都渴望徐老来同我们谈谈。徐老生于一八七六年，这时已是六十一岁的人了，精神矍铄，一约即到。见面那么样的亲热，似乎是老相识，讲话滔滔不绝。

有时我们感觉已经没有什么可讲了，他用手肘碰一碰坐在近处的人，用长沙土话说一声“还有一点子”，就又讲开了。他给大家的印象是那样平易，仿佛是第一次见到的一个平等待人的人。他胸怀坦率，无所忌讳，也没有那样一种对人的猜疑，而是同志式的信任。

抗战初期的中共湖南省委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成立了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同年五月，正式成立湖南省委。据《湖南省志》第一册《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所载，湖南省委名单可以列举如下：

书记 高文华

秘书长 帅孟奇

宣传部长 谭丕模（一九三八年五月接手，其前为任作民）

组织部长兼军事部长 聂鸿钧（一九三八年五月到长沙，其前为郭光洲）

统战部长兼长沙市委书记 任作民

民运部长 郭光洲

在湖南省委成立的时候，《观察日报》的筹备工作也接近完成了。

最早组成编辑部的骨干

《观察日报》编辑部的骨干，最初是由我和北京大学的四个学生组成的。其中至今为许多朋友和同志所怀念的是杨赓。杨赓原名隆誉，是我的中学同学。中学毕业以后，他在北京大学上学，我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上学，同在北平，是常相过往的朋友。抗战初期办刊物和办报纸，他是积极的倡议者、组织者和参加者。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路军办事处成立以后，他就写了一封信申请入党。办事处把这信交给任作民。任向我问了一些情况，当即指定我和张生力为杨赓的介绍人，吸收他入党，时间大概已是一九三八年一月。他和我是《观察日报》夜间工作的基本成员，其他人有改变工作的，有轮换的，只有我们二人坚持到底。他使我感到是一个最可靠的战友，工作十分勤恳，有时也发几句牢骚，但从不懈怠。当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猝然听到他不幸死去的消息时为之惊愕不已。对这样一个毕生忠贞于革命事业的人的下场，实在悲怆极了。

其次是王德昭。王和杨赓是北大同学，是当时唯一带有妻子儿女的人。他参加我们的工作以

后，一个最尖锐的问题是生活。我们的报社是只供伙食，没有工资的，这种待遇使他无法同我们一起工作下去，不久就离开了。王德昭是我们中间最能写的一个，他的离开，大家都感到惋惜。

又其次是汤德明。汤也是北大学生，好学深思，有很好的写作能力。后来西南联大在昆明开学，他就离开我们仍旧上学去了。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我们凑起这样一个班子，就开始出报了。

“书法家”故事

可是临到报纸即将出版的时候，发现还有“观察日报”四字须要找个书法象样的人来写。当时长沙政界名流，我们不会去找。文艺作家，似乎又都不擅书法。最后我想出一个主意，请长沙的一位挂牌卖字的书法家写这几个字。他是职业书法家，没有政治色彩，那一笔字也过得去。大家赞成这个意见，认为把他的字天天印在报上，等于替他登广告，一定乐于从事。没想到书法家既以卖字为生，当然是要给酬金的。问以定例若干，回说每字大洋五十元。我们都是穷光蛋，那里出